

1956—1966 年我国社会 核心价值观构建初探

□ 张学军 于 非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 1956—1966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构建,初步形成了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平等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社会道德风尚、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的社会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关键词]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2)04-0103-04

[作者简介]张学军,石家庄铁道大学思政部教授;于非,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研究生

1956—1966 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对社会核心价值观也进行了积极构建,逐步形成了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平等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道德风尚、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的社会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政治理念的民主平等观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创建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民族国家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消灭剥削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与平等,是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首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一)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理念

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特定的价值观作指导,“任

何一种民主从本质上说都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外化形式,不同民主制度蕴涵着不同的核心价值”^[1]。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列主义的民主思想,对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多种形式进行实践。1956 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2]他还说,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人民必须有权直接参与上层建筑的管理。他告诫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人人负起责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有最深厚、最可靠的基础。^[3]可以看到,我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政治体系中的至高地位,把人民群众看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人民当家作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民主政治价值观的本质体现,人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异化力量,而是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

收稿日期:2012-06-17

本文系 2011 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1DD009)、2010 年度河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Z31002)的阶段成果。

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保障。

(二) 运用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

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能够容纳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价值属性和道德取向。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正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价值属性和道德取向的遵从与实践,即运用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无论是宪政结构还是党政结构都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上取得根本的一致,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人民性质。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制定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和一系列具体法律法规,将广大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以法律制度确立下来,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三) 消除特权阶层,避免两极分化

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消除各种实质和形式上的不平等现象,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平等,首先要反对官僚主义、消除特权阶层。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因此,要彻底消除特权阶层,必须要在思想上消除资产阶级思想。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他认为“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匈牙利的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尖锐。他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4]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党采取了各种措施,在所有制方面,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的比重;在分配制度上,尽可能缩小工资等级之间的差别,尽量减少干部的特权;在干群关系上,要求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要求干部们每年抽调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1957年4月,毛泽东指出“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5]

经过十年探索,我党力倡的平等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如妇女不仅摆脱了在家庭中受支配的

地位,而且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劳动、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权利;人们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人们的收入基本持平,基本消除了两极分化的局面等等。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等政策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成为日后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共同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探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成为党的战略目标,而且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在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研,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被毛泽东在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形象概括为“一穷二白”。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强国梦的基本思路和逻辑起点。

走强国之路的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党对强国之路的探索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起步的,在此基础上,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主要内涵的强国战略日益清晰和完善。

“四个现代化”第一次明确提出是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初表述是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1956年又一次把这个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毛泽东在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长远目标。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月,他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这一思想。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

确指出了关于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在1964年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毛泽东“两步走”的强国战略目标,号召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确立,为我党调整国民经济、推进工业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直到今天,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社会道德风尚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重大胜利的重要经验和不朽瑰宝。

在人生价值的取向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全人类谋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概括,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并将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植于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实现于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在这一思想的熏陶下,涌现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对革命无比忠诚的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6]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7]毛泽东号召大家“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8]正是在这样一种艰苦奋斗精神的感召和指引下,勤劳的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使“一穷二白”的贫困国家走上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变革中,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秀传统注入了全新的政治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

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的社会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积极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条件,因为人具体生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制约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成为为资产阶级生产的劳动工具,劳动只是无产阶级的谋生手段,其劳动的性质异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而使国家政权真正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历史,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只有生产力发展,才能减轻人的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才使人有可能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只有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日益丰富和完善的物质条件。我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进而满足了人民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日益丰富和完善的物质条件。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中提出人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科学把握。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0]毛泽东在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的同时,具体地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的发展;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这一思想成为我国教育方针的核心,指导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实践。

尽管在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和观点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时代烙印,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过失误,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关于人的解放、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思想,对于实现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扬,既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要求,又具有革命的远见性,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所构建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的思想先导。

注释:

[1]刘杰.中国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比较研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11).

[2]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29.

[3]转引自李慎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J].政治学研究,2005(2).

[4][5][10]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46,242-243,226.

[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R].1956-11-15.

[7][8]毛泽东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下):781,800-80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5.

责任编辑:杨艳萍

(上接第93页) for Germany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5 (4): 467-488.

[8]徐桂民,綦建红,鞠磊.劳动力外移、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1984—2004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07(7):22-28.

[9]Christian R. Qtergaard. Knowledge flows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a cluster: Compar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link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9(20): 196-210.

[10]余子鹏,刘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要素效率关

系分析[J].经济学家,2011(8):19-26.

[11]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制度效应——基于一个随机前沿模型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2):58-67.

[12]韩德超.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效率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1(2):65-70.

[13]Benjamin Gomes-Casseres, John Hagedoorn, Adam B. Jaffe. Do alliances promote knowledge flow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1):5-33.

责任编辑:李瑞山